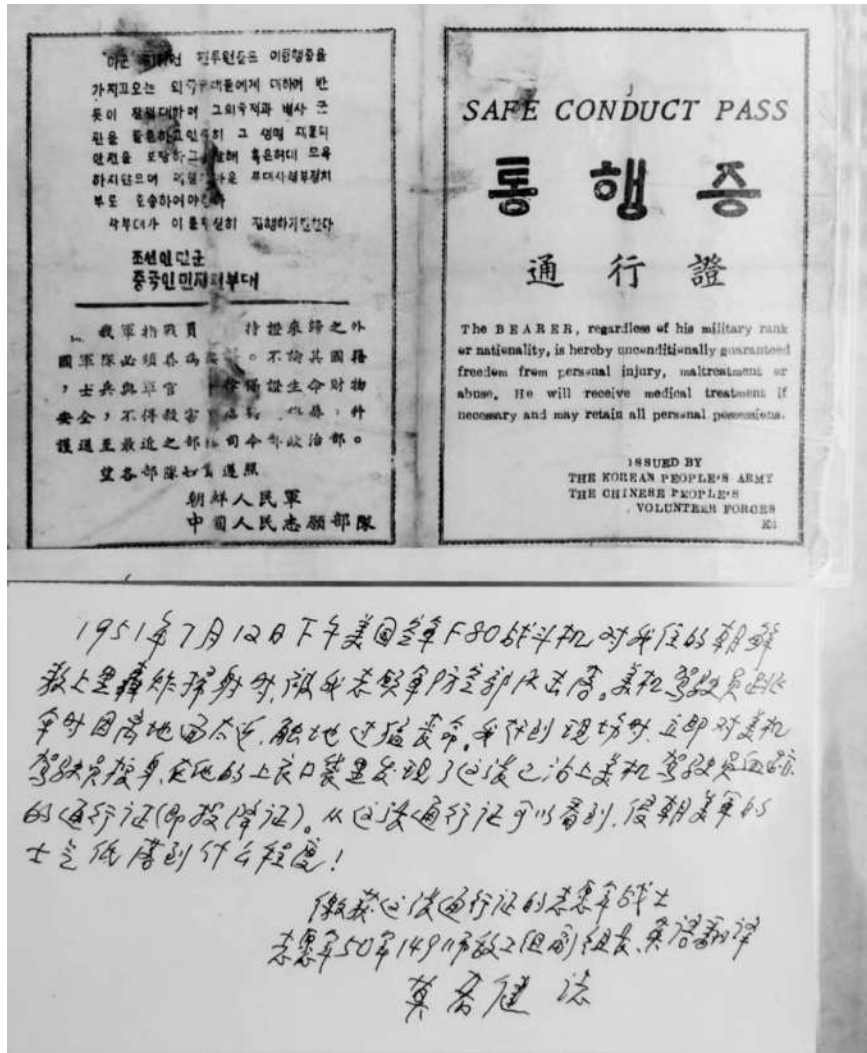


美军飞行员的“通行证”

本报记者 司晋丽



抗美援朝纪念馆馆藏美军飞行员“通行证”，莫若健捐赠。

202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纪念馆新馆开馆不久，便收到了一件稀奇的文物——一张美军飞行员的通行证（投降书）。这件物品的捐赠者名为莫若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政治部敌工组原副组长。近日，年事已高的莫若健老人向本报记者讲述了这件文物的来历。

“通行证”的来历是个谜

莫若健现居四川成都，他少年时师从语言大师吕叔湘，习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担任战地英语翻译。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的官兵们随大部队跨过鸭绿江，加入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到朝鲜后，20岁的莫若健被分配在对敌工作组，主要负责宣传、教育和审讯战俘等工作。

在朝鲜的每一刻，都令莫若健难忘。在敌强我弱的重重包围中，志愿军用力透山河的精神，突破艰难险阻，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史诗。1951年7月12日，一架美军飞机在对志愿军例行俯冲扫射时，飞行员跳伞，但降落伞包还没来得及打开就着陆了，这位飞行员也由于触地太猛而重伤身亡。莫若健到现场例行检查时，发现飞行员的衬衣口袋里有一张卡片，已经沾上了血迹。他小心翼翼地把它从大约32开纸大小、对折起来的卡片打开，发现上面赫然印着“通行证”三个汉字。除了汉语外，还有英、朝两种语言的译文，在底部还有落款：“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部队”。

这张“通行证”，我方人员还是第一次见，它是什么来历？为何这位飞行员会置于贴身的口袋里？这引起了莫若健和同事们的惊奇和猜测。一番论证后，他们

肯定，这张“通行证”并非中方印发。

美军士气低落的铁证

原来，为了瓦解敌军军心，志愿军司令部印发了《投降安全证》，其上印制英语、汉语、朝鲜语三国文字，由敌工部门选拔小分队深入敌后散发、或用炮弹射向敌人阵地。凡是持有此证的，投降均可受到优待。

莫若健回忆说，每次走进战俘群时，不少战俘们都会将中方印发的《投降安全证》举过头顶，央求得到善待。因为他们虽然看到《投降安全证》上书写着善待俘虏，但同时听到一种传闻：志愿军会残杀战俘，有“割鼻子、挖眼”等行为，这令莫若健哭笑不得。反复解释说明志愿军的政策、平复战俘的情绪，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

不过，这名美军飞行员所持的“通行证”与我方印发的《投降安全证》有很多不同。其一，卡片内容是投降政策、卡片名称却非《投降安全证》，而是《通行证》；其二，将“志愿军”写成了“志愿部队”；其三，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关防”大印。

况且，当时美国空军驻地与陆军驻地相距很远，也远离我军投放点，不大可能收到《投降安全证》。在和军事专家们交流后，大家综合判断，这或许是美军私下买到的仿制品。

“如果是一支士气高昂的部队，谁会去绞尽脑汁获取投降书，还视若珍宝，随身携带？这足以说明，尽管美军当时拥有最精良的武器装备，但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官兵们对胜利没抱多大希望，这张“通行证”就是一个铁证。”莫若健说。

将精神密码传下去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周总理指示，经过朝鲜战争考验的200多名英语干部全部调往外交部，这批人员集中在北京通州附近培训。但也有首长考虑到，如果把英语干部全部调走，万一战事再起，就不好办了。于是，包括莫若健在内的一部分人留下来，被送回朝鲜的志愿军学校学指挥，一直到1958年才回到国内。

回国后，莫若健转业到成都大学从事英语教学工作。他发现，原先在成都的一些外国人身上那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模样也不见了。“抗美援朝精神举世震撼，也让世界真正认识了‘中国’。”莫若健为能亲历那场伟大战争而深深自豪。

将这份“通行证”捐赠给国家，是莫若健老人一直的心愿。多年前，他曾专程来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却正值修缮闭馆。2020年正逢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抗美援朝纪念馆新馆也落成了，年事已高的莫若健委托战友的后人前往捐赠。他说，1950年志愿军自丹东入朝走向战场，现在每位前来纪念馆参观的观众都能在这座英雄的城市接受到最生动的教育。

近些年，社会上形成了尊崇英雄烈士的浓厚氛围，莫若健和老战友们也常被许多学校和单位邀请，去讲抗美援朝的故事。在莫若健看来，讲这些“老故事”，并非宣传标榜哪位军人的丰功伟绩，而是想将一代人用牺牲换来的宝贵精神密码传递下去，让年轻人明白，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都需要砥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



莫若健

收集铜币制造子弹

部队人数多了，装备简陋又严重不足。针对这种情况，宋任穷多次在杨庄召开冀南区党委会议，同司令员董再道、副司令员王宏坤、参谋长王蕴瑞、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等领导研究，决定用冀南票（纸币）兑换群众手中的铜钱。

由于宣传工作到位，广大群众为了支援抗战，踊跃捐献和到银行兑换家中的铜钱。仅短短两个月时间，冀南银行就从群众手中兑换了大量铜钱，20多个大瓷缸都装得满满的。平时埋在地下，随用随取。杨庄冀南军区兵工厂副厂长杨其延和兵工技师盖亮，用兑换的铜钱翻新和制造了20多万发子弹，装备了部队，大幅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发放农贷促进生产

冀南银行由于生产车间少，冀南币产量不高，为了扩大发行冀南票和鲁西票，宋任穷就在朝北一带开办了北王李等多处印刷所，使冀南币逐步在大行、大岳和冀鲁豫地区流通。从1941年农历11月至1944年，共有200个县市、4000万人口使用冀南票。

随着抗战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冀南银行的地位和作用愈加突显。1943年初，冀南银行开始向朝北一带广大群众发放低息春耕贷款，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如动员群众用春耕贷款买牲口，组织边沿地区的骡马大会，引进敌占区的牲口以解决畜力缺乏的困难。同年7月，宋任穷在杨庄组织了冀南区军民大生产运动。冀南银行在大生产运动中开展信贷工作，以帮助生产为重点，辅助刺激农业发展。由朝北、莘朝县政府贷款所购置的大小农具不下一万多件。

信贷工作在对敌贸易斗争、生产、救灾物资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它减轻了人民负担，增加了财政收入，减少了财政开支，稳定了物价，保持了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

【牛贵葆系莘县融媒体中心高级编辑，闫洪涛系莘县大王寨镇党委书记，马章文系莘县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地方史志研究中心）主任】

宋任穷与杨庄冀南银行

牛贵葆 闫洪涛 马章文



冀南银行五百元券

山东莘县大王寨镇杨庄村是鲁西北红色文化资源相对集中的地方，在村南主街道有一处冀南银行旧址，成为一道红色旅游亮丽的风景线。

冀南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是我党在抗战时期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银行之一。1939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在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一间农家四合院挂牌成立。

这里至今仍然流传着很多关于冀南银行的故事……

金融市场站稳脚跟

1941年农历11月，经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总部批准：冀南区党委书记、冀

南行政公署主任、冀南军区政治委员宋任穷带领冀南党政军部分后方机关陆续转移至杨庄村，冀南银行也随同一起转移至杨庄。

宋任穷和夫人钟月林住在村民夏少增家中，冀南银行设在抗日堡垒户、地下党员夏炳银家中。“行无旧址随军游，工无桌椅在炕头；有事即办无日夜，钱账随身安无忧”。这首由当年冀南银行普通员工撰写的打油诗，再现了抗战岁月的冀南银行（也称“马背银行”）的真实工作场景。在杨庄，宋任穷高度重视财政经济工作，把它作为抗日根据地生存、巩固

和发展的关键。因此，宋任穷提出：要造出独立自主的地方性货币，发行冀南票和鲁西票。

在冀南票发行初期，市面上法币、山西币、河北票以及各种流通兑换券，五花八门，甚至还有伪钞鱼目混珠。对此，冀南区专门成立了经济委员会，宋任穷担任主任，并以冀南行政公署名义颁布《禁止敌伪钞暂行办法的通告》。

宋任穷指挥了整个冀南区货币整顿活动，让冀南币占领市场，沉重打击了伪钞。肃清了土杂钞，在整个冀南区逐步建立冀南币为本位币的统一市场。历经艰苦斗争，冀南币信誉上升，阵地扩大，币值增高，站稳了本位币的脚跟。

自制纸张印刷钞票

在杨庄期间，冀南银行印刷发行统一货币冀南票和鲁西票，最缺的就是坚固耐用的纸张。怎么办？宋任穷发动群众想办法，并找当地有造纸经验的工人和群众做调查。

村支书夏炳银献计说：“有一次我外出打拳卖艺，正好碰见一个茶叶店老板用一种皮纸包装茶叶，我就问他这种皮纸是用啥原材料制成的，他随口说是用老树皮做的原料。我们何不附近采集老树皮用它造纸呢？”

当时，杨庄村外是一片树林，树林中有松树、柏树、杨树等各种树木，大一楼多粗，树龄至少在百年以上。后来的事实表明用它造纸、印刷冀南币再好不过了。

发动群众试制油墨

宋任穷还就缺少油墨多次召开民主会，群策群力想办法，并找了十几位老人座谈。其中一位教书的夏老师说，可以用土方造油墨，就是将松膏烧制成烟油，在调上熟桐油就可以了。于是，宋任穷就带领银行员工和一些干部战士，到杨庄树林中砍松木，取松膏，试制油墨，反复几十次，终于试制成功。

由于在杨庄统一了货币，宋任穷在对敌贸易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搞活了金融市场，不断积蓄和壮大了抗战力量。截止1943年年初，冀南军区部队由最初前进时的5个连，发展到拥有7个旅6万多人数的正规部队，还有6个军分区、各个县大队、区小队、村民兵组织，总人数不下十几万之众。



鼓浪屿“宫保第”背后的故事

——台湾雾峰林家祖孙三代一门忠烈的故事

本报记者 照宁



厦门鼓浪屿鼓新路67号，是一座名为林公馆的欧式别墅，也被称为“宫保第”。南洋风格的建筑和门前树立的墓碑，显示这里曾有不同寻常的故事。这里是林祖密的故居，主人是著名的台湾雾峰林家后人。雾峰林家，其祖籍在福建省漳州平和，后渡海赴台，曾与鹿港辜家、基隆颜家、板桥林家、高雄陈家并称为“台湾五大家族”。

雾峰林家满门忠烈的悲壮故事是台湾历史上的一个传奇。假如说一个家族能出一个民族英雄已经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而雾峰林家却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英雄。马英九先生曾为雾峰林家题词：“三代民族英雄，百年台湾世家”。

林祖密的祖父林文察为清代著名台籍将领，清廷曾封林文察为太子少保，因此林文察所住过的宅地被称为“宫保第”。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林文察率领部队屡建战功，受清廷重用，从而获得福建省（当时含台湾地区）的樟脑专卖权。这使得林家财富快速累积，一跃成为全台湾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

林祖密的父亲林朝栋是林文察的长子。1884年中法战争，法军进犯台湾基隆。奉台湾巡抚刘铭传之命，身为兵部郎中的林朝栋带兵从雾峰北上抗敌，一战成名。因抗击侵台法军、开拓台湾有功，享有“只有国，不知有家”之誉。

1877年，林祖密出生。原本以为平顺丰足的一生因中日甲午战争而改变。1895年4月，清廷被迫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其后，雾峰林家的后人林朝栋、林祖密等丹心不改，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占领中国台湾，父亲林朝栋率领民众和将士抵抗日军，终因寡不敌众，忧愤回到大陆，在厦门鼓浪屿内厝澳修建了林家别墅“宫保第”。不久，林祖密奉父亲之命回台湾管理



清乾隆御铭端石修楔图砚



御铭端石修楔图砚(局部)，清乾隆，长25.9厘米，宽16.4厘米，高8.4厘米。

清乾隆御铭端石修楔图砚呈长方形，由端石制成，砚面及侧面镌刻兰亭雅集图景，极具文人品位，砚背浅雕荷塘群鸭图景。

此砚内侧镌刻乾隆帝御题观铭，曰：“宋时端溪已艰致，刻绘兰亭更韵事，山庄获一已为珍，侵寻逮此凡有四，物聚所好

好因文，玩役耳目究增愧，依然墨池坐右军，愿此儒毫以作字。”句后署“乾隆壬寅仲春御题”，并钤两枚闲章。“壬寅”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据了解，此砚随形配紫檀木盒，盒面嵌白玉透雕龙穿花纹饰件，为乾隆时期明显装饰特点。